

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动因、影响及启示

周旺东

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一场由政府组织倡导的,持续时间最长、涉及面最广、影响最深远 的社会活动。针对这场运动,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,对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起源、进程和结局进行了大量分析,但 对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基本动因、历史进程及政策终结的看法,以及对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影响等问题,尚未达 成共识,存在较大争议。笔者认为,分析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动因和影响,对我们探索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、实现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、实施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等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。

一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分析

我国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:第一阶段(1953~1968)的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,以经济 因素为主导,以解决城镇就业压力、满足农村建设需要为主要目的;第二阶段(1968-1980)的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,有 明显的政治倾向,以“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”、“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”为主要目的。两个阶段“上山下乡”的基本动 因不同、影响各异,具体分析如下:

(一)第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

1953~1968年间,为新中国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第一阶段,这一阶段的“上山下乡”,主要有两个目的:

一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。作为一个自古以来的人口大国,到1954年,我国人口突破6亿。由于人口基数大,增长 速度快,就业难问题日趋严峻。但当时建立在战争废墟之上的新中国,工业相当落后,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。加上 社会主义改造对商业、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大幅度压缩,限制了第三产业对富余劳动力的吸收。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, 也就成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:“新增加的1300万劳动力,能插入工业的不过百万,其余1200万要在乡村工 作”(李富春,1957);“城市人口太多了,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是改造自身的最好办法”(叶剑英,1958);“计划生育搞 得好,以后知识青年就可以在城市里改造,而不必上山下乡了”(张春桥,1960),这些批示,足见当时的知识青年“上山 下乡”,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问题(尤其是城市就业问题)密切相关。

二是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建设。农民文化素质低,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。《人民日报》 发表题为《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》(1953年12月3号)的文章,指出“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、生产队长、会计和技术人员,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”,率先通过中央报刊 呼吁组织青年到农村务农。毛泽东在《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》(1955年)中指出“全国合作社需要 几百万人当会计,到哪儿去找呢?可以动员大批高小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份工作”。正是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号 召下,大量知识青年返回农村、返回家乡,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建设,成为“上山下乡”的先行者。这表明让知识青年 “上山下乡”、深入农村,是党和政府提高农民素质、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一次重要尝试。

(二)第二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动因

与第一阶段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、支持农村建设等经济动因不同,第二阶段知识青年“上山 下乡”运动,主要是缘于政治因素:首先是“文革”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兴起,后来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,在当时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,毛主席针对这种发展态势,发出“由工农兵给红卫兵以再教育”的指示(1968年9月11日),红卫兵运动 转向为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运动;其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。为防止西方势力的“和平演变”,毛 泽东提出了“反国内修正主义”,反对“死读书”,主张青年学生“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,与工农群体相结合”;再次是知 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需要。1968年12月22日,毛泽东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重要指

周旺东,男,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高校教学与管理。

示,认为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人、农民相结合,就会一事无成,就是‘资产阶级的尾巴’”,认为接受工人、农民的“再教育”,是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,而“上山下乡”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必然选择。可见,这一阶段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更多地是出于领导人对时局和政治因素的考虑。

(三)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终结

“文革”期间,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所暴露的弊端越来越突出,并被中央有关部门所察觉: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“李庆霖上书案”(1973年)获得毛泽东“全国此类事甚多,应当统筹解决”的批示后,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解决知青问题。就在毛泽东对“李庆霖上书案”批示后的第二天,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,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过程中存在的问题,并于随后组织了13个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”展开调查。在此基础上,在北京召开了“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”(1973年6月),检查、检讨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研究了“统筹解决”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方针政策。之后,知识青年在“返城、就业、学习、生活”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较多的机会、较好的条件,开启了知识青年的返城步伐。

知识青年返城,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:一是“两招一征”,即“招生、招工和征兵”:首先是招生返城。一些知识青年进入中专、技术或大学就读,无异于“衣锦还乡”,但这只是知识青年中一小部分人的幸运;其次是招工返城。20世纪70年代初,随着城市生产秩序的逐渐好转,以及工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,城市用工需求大增,为知识青年返城提供了更多机会;再次是招兵返城。这也为知识青年跳出“农门”开辟了极其重要的途径。二是“两退”,即“病退”与“困退”。一方面,20世纪70年代初,针对知识青年自身或其家庭确有特殊困难、无法承受“上山下乡”的超强度体力劳动者,以及受农村缺医少药影响而伤残者和未及时治疗的情况,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给予“免下”或“缓下”的政策优惠;另一方面,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实行规定(草案)》(1973年)提出“允许身患严重病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下乡知青,经相关部门的批准返城”,为已“上山下乡”的知识青年返城提供了重要途径。

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成为城市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重大政策转折点,云南洪景农场知识青年请愿风波之后,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返城风潮。《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》(1980年9月6日)明确要求“能够不下乡的,就不要下乡”,1981年各省省级“知青办”的撤离,宣告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政策的终结。

二、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对我国的影响

在中国持续27年之久,人数超过1700万之多的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:

(一) “上山下乡”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影响

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,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:首先,“上山下乡”不仅仅是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升学、就业压力的途径,更是党和政府试图改革农村社会贫穷、落后面貌的探索,在推动农村经济、社会发展以及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其次,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在提高农民素质、推广农业技术、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建设、农村合作化组织建设对人才的需求;再次,知识青年进农村,对改造农民小农思想、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、普及农民科技文化知识、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习惯等,也有着积极意义。可以说,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入了“生产的血液、科技的血液、现代的血脉”。

(二) “上山下乡”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

对“城市化”的界定,目前理论界的争议颇多,有的以人口的集中度为评价标准,有的以生产结构的变化为评价标准,更多的则是以城乡人口比例为评价标准。从城乡人口比例标准的角度来讲,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,是中国的“倒城市化”过程:在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27年间,全国超过1700万的城镇知识青年被“下放”到农村。这期间,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: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,由平均16.6%上升到30.6%;世界城市化率,由平均29%上升到41.4%。但是,受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等诸多因素的影响,中国的城市化率,却从1958年底的18.5%下降到1978年的17.8%。

从表面上看,是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政策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率的停滞。但是,这背后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:首先,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,排斥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:在工业化初期,资本极度稀缺,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,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,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,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。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新中国,一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,排斥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;其次,第三产业发展滞后,限制了

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在“重产出、轻流通,重生产、轻服务”观念的影响下,第三产业发展缓慢,甚至有停滞、萎缩趋势,影响了其对劳动力的吸收;再次,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社会制度,影响了城市就业机会。所有制结构方面,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,基本消灭了外资经济、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,致使就业门路相对狭窄。社会制度方面,国家在实施“统包统分”就业分配制度的同时,又不能为毕业的知识青年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,只能将他们“下放到农村”接受“再教育”,这既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、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,也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。

三、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启示

(一)对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启示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国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,是党和政府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困难,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措施,能够被人民群众所理解。但是,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不能、也不应该成为长期政策,不能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长期措施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,解决就业难问题,关键在于发展经济;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并没有继续实施“上山下乡”政策,但城镇不仅解决了几百万“返城”知识青年的就业,安排了几千万新成长起来的待业青年,还吸纳了几千万农民工进城务工。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继续推进,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,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将逐渐被取消,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将变得更加畅通、更加符合市场原则,因为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,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、高效利用。

(二)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启示

主张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,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观点,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。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,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,强调密切联系群众。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,大批知识分子在群众斗争中磨练成为革命精英,领导人民历经无数战争考验,最终取得战争胜利,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取得成功的典范。新中国成立后,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想通过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来深化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,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:一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,应该是形式多样的自主结合,但当时要求知识青年和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甚至做一辈子农民,这种片面的、僵化的结合,是对“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”的误读;另一方面,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,本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、互相教育的过程,但当时的结合,只要求知识分子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,这种单方面的教育,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。因此,我们要正确审视、理解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问题:两者的结合应该遵循事实和需要,在市场规律和客观需要的引导下,互相结合、互相学习,达到相互帮助、互相提高的目的。

(三)对实施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的启示

自1999年在海南率先试点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以来,我国越来越多的省份实施了这一计划,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有人因此表现出担心、谨慎。笔者认为,两者在人口流向(从城市流向农村)和目的(解决就业难问题)上有相似之处,但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不是对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简单复制:一是两者时代背景不同: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是计划经济的产物,“上山下乡”带有政治强制性特征,知识青年没有主动权;“村官计划”中的大学生,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前途,是“理性经济人”的主动选择;二是两者主体文化层次不同:“上山下乡”的知识青年,大多只有高小、中学学历,少数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,还有退伍军人,整体文化层次不高;“村官计划”中的大学生,多是本科毕业生,也包括部分硕(博)士毕业生,文化层次较高;三是身份、待遇、时限不同: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后,落户在农村,要与当地社员一起劳动、一起争工分,有的一辈子扎根在农村;“村官计划”中的大学生,到村任职有相应的政策跟进,享受大学生待遇,并有相应的进退制度和渠道。可见,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,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对实施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:“村官计划”必须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个人意愿和利益诉求,不仅要改善下乡大学生的工作条件和待遇,还要为大学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、畅通的渠道、广阔的空间,让其充分施展才华、发展自我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红艳.知青“上山下乡”中的文化势差分析[J].延安大学学报(社科版)2006(1).
- [2]蒋得兴.新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刍议[J].法制与经济2009(5).
- [3]杨晓明.知青后代记忆中的“上山下乡”[J].青年研究2008(11).
- [4]卓人政.云南知识青年回城事件与全国知青问题的解决[J].中共党史资料2009(1).
- [5]李春亭.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互动发展[J].生产力研究2007(2).
- [6]肖立辉.新“上山下乡运动”的现实难题[J].人民论坛2008(6).

责任编辑:施由明